

城市与萧红的性别书写 ——以萧红笔下女性人物为例

朱燕颐¹, 杨 扬²

(1.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2.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 200040)

摘要: 萧红从乡村小城进入城市空间, 都市的现代景观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令萧红的性别意识开始觉醒。伴随着地理空间的改变, 萧红的人物塑造与性别叙事中的空间书写、身份书写相结合, 呈现出从单一向多元发展的特征, 其性别意识经历了关注女性、建立自我主体和审视男性三个阶段。萧红在乡村空间向城市空间转换过程中性别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在乡村女性长期失语的文学史书写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萧红; 乡村社会; 城市空间; 性别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0)06-0059-07

Cities and XIAO Hong's Gender Descriptions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XIAO Hong's Works

ZHU Yanyi¹, YANG Yang²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2.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urban landscape and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of “May Four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enabled XIAO Hong's gender consciousness to be awakened while she moved from a small country town into urban area.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the geographical spac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XIAO Hong combined the spatial writing with identity writing in gender narratives, and demonstr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from single to pluralism. And her gender consciousnes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focusing on female, establishing self-subjects and examining male. The awak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XIAO Hong's gender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space to urban spa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rural women's long-term aphasia.

Key words: XIAO Hong; rural society; urban area; gender consciousness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 新一代中国知识女青年接受了思想启蒙, 性别意识开始觉醒。她们意识到, 女性独立于男性的自我价值实现要依靠自我解放和经济独立, 为此, 她们追寻“五四”启蒙者的脚步, 到都市去寻求个人的出路。都市空间为女性提供了更好的成长空间, 但也让她们面临更深的困惑。同时, 随着现代都市的崛起, 城市空间转变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表达场域, 由于空间书写与作者的社会背景和主体意识有着密切关联, 女作家们笔下的乡村与城市空间成为体现她们主体意识与性别意识

收稿日期: 2020-07-10

作者简介: 朱燕颐(1989-), 女, 安徽合肥人,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杨 扬(1963-), 男, 浙江余杭人,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载体。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的萧红,从乡村小城镇空间向都市空间转移的过程中,以经验写作的方式书写着女性心理的变化和自我身份问题。萧红的创作从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到构建主体意识,最后以审视目光审视男性,体现出她的性别意识伴随着城市经验积累而产生的变化和发展。

一、城市与萧红的性别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女性解放议题,将立足点放在父/子、新/旧、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上,其中的性别因素反而被这些权力冲突消解了。即便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和现代都市景观依旧使得一批女性知识分子获得了性别意识,从乡村小城呼兰进入现代化都市哈尔滨求学的萧红便是其中之一。萧红通过都市的现代学校教育以及由此进行的人际交往,开始接受现代启蒙思想。萧红没有经受过系统的女权理论学习,但哈尔滨的“东特女一中”设置的新式课程和老师们推介的新文学作品使得她的性别意识萌芽。与老师高仰山(即高昆)交往前,萧红喜欢读张资平等人的言情小说,但经过高老师的指点,萧红开始“看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五四作家的作品,“在校3年,读遍了学校所藏的所有新文艺书籍”。^{[1](p85)}鲁迅等人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让萧红开始思考个体的人的价值。同时,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萧红还涉猎了大量的西方文学,读“俄国小说《复仇》《猎人笔记》,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屠场》《石炭王》,读歌德的《浮士德》,读《娜拉》《雪莱诗选》《海涅诗歌集》,普希金的《自由歌》”^{[1](p86)}等等。西方文学中歌德、雪莱等人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孕育了萧红的抗争意识,《娜拉》等文学作品又强化了萧红作为女性的性别意识。

萧红在都市萌发的性别和抗争意识,为其提供了一个观察她曾经熟稔的乡土的现代性别视角。通过这一都市现代视角的关照,她发现了那些乡土社会中女性的不幸,这最早体现在她放假回家时与继母妹妹梁静芝的交谈中。萧红希望她去女子小学读书,不要听信道德会学校教授的“假道德”,告诫她结婚不要选择有钱的纨绔子弟,宁可找贫穷的文化人。^①这种具有现代意识的婚恋观源于萧红阅读的新文学作品,她已经初步认识到封建家族婚恋传统对女性的压迫。她认为,接受现代教育是女性的唯一出路。萧红为了完成学业历经重重磨难,遭遇人生第一次惨烈的被抛弃,被困旅店险些被卖去做妓女。她向《国际协报》求助,最终借洪水逃脱并与萧军结合。正式加入哈尔滨左翼作家队伍后,萧红的创作便呈现出强烈的经验写作特质。她以乡村女性命运为主要创作题材,将目光聚焦于女性本身,这与当时其他以女性角色为主角的作品有很大区别。在发表萧红作品的《大同报》文艺副刊中,女性题材的作品多以表现都市女性的情爱为主,或者为妇女解放和革命主题服务,而萧红的作品则关注女性本身,她们身为妻子、母亲遭受的压迫,生育的痛苦和随之而来的死亡威胁,以及在贫穷落后的社会里女性彼此之间可贵的情谊。

需要注意的是,萧红的性别意识觉醒不仅仅是接受现代启蒙教育的结果,都市现实生存经验,即萧红性别觉醒后在抗争过程中身体所遭受的生存苦难经验,这使得她对那些苦难中的女性给予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是“五四”新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萧红都市生存经验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萧红初期的短篇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命运悲惨的底层女性形象,《王阿嫂的死》中受尽欺凌的王阿嫂和失去双亲即将面临未知黑暗命运的女儿,《哑老人》中被女工头打死的孙女,《夜风》中贫穷的洗衣婆子,《渺茫中》里被抛弃的独自带着孩子的女人……萧红基于自身都市生存经验观察女性命运,她发现她们面临的主要困境依然是基本生存困境,造成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是贫穷。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反映了萧红早期的性别意识引发的女性生存危机,即由从乡村小城来到城市,又无法真正在城市中立足的困境。她和萧军共同居住在商市街的日子里,饱尝了饥饿的痛苦和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情感问题。因此,萧红从自我都市生存经验出发,在创作中呈现乡村社会女性问题的根源在于落后的生产力造成的人的异化。在传统社会,女性不得不依赖于男性才能获得生存资源,这是女性遭受性别压迫的根本原因,与新文化运动认

^① 参见王化钰《访梁兰亲妹梁静芝及其丈夫马天浩老师》《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季红真《萧红全传》,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

为妇女解放问题的关键在女性能否获得独立经济能力的观念相吻合。

女性面临的困境除了物质生存之外,还有生育带来的生命威胁。萧红的女性生育叙事不是从书本的知识出发,而是从她个人在哈尔滨医院的生产经验出发,是她身体直接感受的经验书写。这始于她反抗与汪恩甲封建包办婚姻,但由于性格的软弱,在汪恩甲的纠缠下又与其同居怀孕的经历。受孕本应当是爱的结果,但对萧红而言,首次生育经验却是一种苦涩的回忆。作为非常重视恋爱自由的女作家,萧红早期的创作中却很少书写恋爱,通常直接描写生育为女性带来的痛苦和死亡的威胁,这与她本人在哈尔滨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第一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对生育的疼痛描写和最后因生育而死的结局设置,体现出萧红早期创作中对女性的苦难想象,这显然与她自身经验密切相关。而另一篇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短篇小说《渺茫中》描写了一位被抛弃的独自带着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是一位“在不曾结婚以前,他为着世界,工作一起”的人,与他私奔的女子也是一位“很能干”的女性。在小说的结尾,被抛弃的妇人望着“生活在这小街上同一命运的孩子们击石子”。^{[2] (p68)}可见萧红意识到被抛弃是许多女性和她们的孩子的共同命运,这种感知可能是基于她身怀六甲被汪恩甲遗弃在哈尔滨旅馆经验的隐形书写。萧红早期的都市两性关系的身体感知经验消解了她从书本和学校教育接受的关于爱情浪漫的形象,爱隐退而性凸显。萧红在哈尔滨感受到的性不是两性基于爱恋的性,而是基于男性与女性动物般原始欲望的发泄。在哈尔滨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生死场》里,金枝在懵懂中怀上成业的孩子,萧红并未对这对少年人的青涩初恋有过多描写,只以惨烈的笔触着重叙述了两人交媾的场景:

他的大手故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管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作出来。^{[2] (p212)}

萧红敏锐地意识到,基于性的两性关系不可能持续,女性也不会获得男性长久的关爱,当女性的性吸引力消退,男性就会移情别恋或者遭到无视。这种基于欲望的两性关系是萧红都市经验的直接展现,她在作品中塑造成业的嫂子这一角色就是这一经验的具象符号。虽然其与金枝无亲无故,但她的女性经验让其对金枝的命运感到忧心,这种经验是基于她丈夫婚前婚后态度的变化 and 对自己暴戾的态度:

等你娶过来,她会变样,她不和原来一样,她的脸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男人们心上放着女人,也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吧!^{[2] (p214)}

女性之间基于共同的两性经验缔结互相关照的质朴情谊,在《生死场》中多次出现。月英因瘫痪被丈夫虐待导致下身腐烂生蛆,只有王婆和五姑姑照顾她,惦记着她爱吃的咸黄瓜,为她擦洗身体;当小说里的女性遭遇残酷的生育“刑罚”时,也只有村子里其他女人守护在身旁照料,她的丈夫却醉醺醺地扔东西打她。王婆服毒之后,为她痛哭的只有女人,她们不仅在哭王婆的死,也在哭自己同样绝望的命运。这种女性之间的情谊是萧红性别意识觉醒之后的一种人道主义的苦难关照。

当萧红意识到乡村女性面临的绝望与困境后,她曾试图通过“进城”来改变命运。在哈尔滨东特女一中求学的经历曾给她期待和憧憬,她在这里接受新思想启蒙和教育,一度认为逃往都市能够得到文明与秩序的庇护。但残酷的现实让她认识到,都市并不是乡村女性的庇护所。在《生死场》中“到都市去”这一章节里,萧红为日军入侵乡村后面临严重生存威胁的金枝安排了逃往哈尔滨的情节。但进城的金枝只能栖身于城市边缘的街道,这里聚集着所有和她一样被城市视为可有可无的底层人们。这是一条连警察也没有的街道,警察象征着城市的秩序,所以这条街是没有秩序的。刚刚从乡村社会中进入城市的独身女性金枝,又身处这条街食物链的底层。这些事只有已经来到都市很久的周大娘知道,所以她坐在松花江边,“眼泪是为着她末日的命运在流”,但金枝还不知道,“刚来到都市,她还不懂得都市”。城市无法为金枝这样的乡村女性提供生存空间,她最终只能在饱受欺凌后再次回到乡村,这是初入都市的萧红在历经坎坷依然融入城市失败后认为跨越城乡地理空间的女性们最可能的结局。

二、城市漂泊与萧红的文学观

离开哈尔滨,短暂停留青岛后,萧红到达上海。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学中心,这里有全国

数量最多的出版社和文学期刊,有最为庞大的读者群体,换言之,上海提供了萧红成为职业作家所需要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上海是萧红能够真正走上文坛最为重要的城市空间,正是在这里,萧红结识了精神导师鲁迅。在鲁迅的大力提携下,萧红凭借《生死场》进入主流文坛,成为知名的职业作家。鲁迅在与美国记者斯诺夫人会面中称赞萧红是当今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胡风也认为她的文学才华在萧军之上。在上海期间,萧红几乎所有的人际交往都是围绕着萧军而展开,鲁迅给她引荐的朋友也大多是茅盾等左翼人士。

萧红虽然也赞同革命的宏大叙事,但她更注重自我的心灵感受,注重于文学书写的自我经验。在和萧军关系稳定时,萧红还在做自我检讨,“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而深深自责,“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但当她发现“为了人民”的左翼作家“为了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记了人民,而且忘记了性命”^{[3] (p174)}后,她的那种自责就消失了,“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3] (p174)}她渴望独立和被认可的现代女性意识与上海左翼革命文化产生了冲突。以萧军为代表的男性左翼作家对她的创作的轻视,令她认识到,她所处的都市还是由男性话语主导,城市为现代女性解放提供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

特别是当战争形势的日渐严峻,城市的多元文化逐步让位于抗日文化的宏大叙事,这进一步挤压了女性的话语表达空间。萧红清醒意识到,在战争环境中,身处都市的女性,“天空是低的”,即使她“要飞”,但缺乏条件,她意识到,“我会掉下来。”这其实表明了女性在革命化的城市话语中的一种困境,一种自我的分裂,“我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4] (p134-135)}这也是后来都市作家张爱玲感叹的,“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5] (p102)}一方面,萧红意识到她应该像其他的男性左翼作家一样,抛开个体的自我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宏大叙事中去,但另一方面,萧红又在告诉自己,作为女性作家,她应该忠实于内在心灵的真实。对于萧红本人来说,她的个人气质与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格格不入的,她虽屡遭苦难,但始终“保有纯洁和幻想”,性格“稚嫩和软弱”,说话“自然而直率”。^{[6] (p125)}萧红这种都市现代女性精神气质让萧红产生了与上海的左翼作家之间难以融合的裂缝,她实际上是游离于左翼文坛之外,当鲁迅去世之后,萧红与上海的左翼文坛基本上失去了联系。当这种疏离和隔阂与她个人情感挫败感关联起来后,萧红就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特别是鲁迅离世后,萧红的这种孤独感日渐浓烈,这一时期,她写给萧军的信中弥漫着浓郁的孤独情绪,“我孤独得和一张草叶似的了”。^{[3] (p156)}强烈的孤独根源在于萧红在城市中的漂泊感,城市无法为她提供精神港湾。她在诗中写道,“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3] (p21)}这种寂寞的孤独影响到了萧红的文学观念,她认为,伟大的文学是文学家“寂寞孤独了起来,于是回忆从前的生活”^{[3] (p230)}的产物。萧红的孤独寂寞是不被男性及其代表的革命话语理解而产生的难以消遣的孤独,《小城三月》中的翠姨的遭遇寄寓萧红的这种心境,翠姨死后,连她暗恋的表哥也不知道翠姨是为她而死,“哥哥落泪,他不知道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纳闷”。在根本上来说,萧红的孤独是基于她那超越于战争时代的精神孤独,这种孤独是萧红在现代都市中体验到一种切实的身体感受。

全面抗战开始后,萧红辗转于武汉、西安、临汾和重庆等城市。战争环境中城市间的漂泊经历更强化了萧红自我身体经验为出发点的文学观念。在武汉,萧红参与了《七月》杂志举办的一系列文艺活动。萧红认为留在后方观察生活一样能写出反映抗战的作品,创作的关键在于抓住生活细节。在1938年6月的“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主题座谈会中,萧红表达了自己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文学观念,她认为,许多作家写不出作品的原因不是“作家和生活隔离了”,而是“我们抓不到”,^{[3] (p227)}对所写题材在情感上不够熟悉。她说,“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3] (p230)}在临汾与丁玲的会面加深了她对自我主体的认知,以自我经验为基础,在创作中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以此发出作为女性自己的声音。她将正面的战争描写转化为日常叙事中平民生活所受到的战争的影响,将女性的目光着眼于个体。在《无题》这篇文章里,她写到了女伤兵,她的感情是出自女性间的同情与关爱,以及发自人性的哀恸。面对着女伤兵残缺的肢体,她无法像其他作家那样觉得这是一种荣耀,从另一个角度表达对战争造成的女性肉体与精神伤害的愤怒,“成为一个母亲,当孩子指问到她的残缺点的时候,无论这残缺是光荣过,还是耻辱过,对于做母亲的都一齐会成为灼伤的。”^{[7] (p231)}她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带上了人道主义色彩,回归了女性主体本身。萧红看见被战争遮蔽的人的其他身

份,这些身份已经在战争中淡薄得辨认不出。萧红看见这位受伤的女兵,关心的是当未来她的孩子询问她受伤的原因时她所感受到的羞耻。这种感受在主流抗战叙事中是失语的。萧红的个体意识与民族国家话语发生了冲突,她认为即便在民族救亡的宏大时代话语下,女性个人为了生存和幸福而作出的努力也不应当被掩盖。

在战争中,萧红观察后方生活,发现了女性命运悲剧的一致性,并在笔下的女性人物中得到体现:无论是身处乡村的金枝、王阿嫂、小团圆媳妇,还是《渺茫中》里被抛弃的妻子、《小城三月》里不敢反抗家族安排的婚姻最后郁郁而终的翠姨。她虽然没有过多塑造都市女性形象,但城市空间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乡村的视角。《呼兰河传》是萧红漂泊过十座城市,最终落脚香港创作的小说。在这部作品里,萧红用娘娘庙与老爷庙的隐喻来表现乡村社会的性别权力结构:

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什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因。^{[8] (p118)}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之下,女性神明的威严都被消解了,相对于男性神明的令人望而生畏、心悦诚服地下跪磕头比起来,女性神明也显得十分温顺,可以随意欺侮。神明之间的权力结构即是现实性别关系的投射。乡村女性很难从婚姻中得到被爱的愉悦,婚姻只是标志着生命进入另一种折磨里,折磨她的人由父母换成丈夫和公婆。乡村社会的人具有鲜明的动物性,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女性也成为牲口一般的男性的个人财产。老王婆后来成了《呼兰河传》里的王寡妇,她的孩子在意外中死了,但她只能假装平静地活着。曾经的老王婆像祥林嫂一样一遍遍重复孩子死去的过程,只是她甚至不能像祥林嫂一样为孩子的死痛哭,反而要辩解“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好像不这样反复对自己洗脑,内心就要崩溃了,但生活又不允许她的崩溃。在王寡妇这里,死去孩子的姓名也只有母亲记得,她只能偶尔在街上或者庙台上狂哭一阵,这在他人眼里也是疯病犯了,如果经常发疯就要被当作叫花子随便欺侮。女性不但随时可能被剥夺生存权,连情感的自主权也没有。

三、都市视角与故乡回望

由于局势的恶化和越发边缘化的创作观念,萧红被迫逃往香港。香港是一个相对内地而言有很大差异的政治文化空间。在日军占领香港之前,港英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中立且偏向日本的。这导致大陆的抗日宣传在香港受到阻碍,即便有许多大陆知识分子来到香港避难并进行抗日宣传,但只能通过隐晦的方式进行,比如咖啡沙龙、下午茶会、芭蕾舞等,无形中将浓郁的政治色彩消解于都市文化之中。香港与大陆不同的政治局势和文化背景,令作家们产生了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困惑,又对故土遭受的侵略和战乱感到揪心。许多左派进步刊物为了在香港复杂的局势中生存下来而模糊立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华商报》也依据周恩来的指示“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9]但这些刊物中很少见到作家们对香港本土的描写,依然主要关注着大陆的局势。除了大陆的抗日思潮以外,香港还有许多其他的文艺思潮,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多元和包容的文化环境。这样的文化气氛让下定决心不刻意融入抗战文学的萧红能够自由进行创作。正是身处殖民地香港的城市空间,她更关注战争对于传统乡土中国的影响,萧红回望了曾经同样被日本侵占的故乡。同时,对乡土和城市、底层农民们和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来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远离大陆和故土的香港,萧红开始了最后的精神还乡之旅,以呼兰系列创作再次回望故土。《呼兰河传》前半部分对于呼兰城的总体图景描绘时着重强调了呼兰人的麻木与冷漠,在一片灰色寒冷的基调中,冯歪嘴子是唯一不同的一抹暖色。虽然他被分到花园以外的磨房,被整个家族隔离开,但他依然对家中的人们很热情,即便经常遭到捉弄。只有跟同样被家族排挤的有二伯能说上话。虽然在这样边缘的环境中生活,冯歪嘴子却是少有的鲜活的人,与之前呼兰人物群像形成鲜明对比。他用微薄的工钱为“我”买黏糕,有了妻儿之后虽然被磨房主人粗暴地赶走,他也依旧毫无怨言,和妻子认真地过生活。他像是感知不到负面情绪和他人的恶意,他的妻子也是同样一个生性乐观的人,将贫苦的生活打理

得井井有条,并且“能说能笑”,是一个“很响亮的人”。在麻木的呼兰人里这样的人很刺眼,不仅认为他们都不是好东西,甚至盼着冯歪嘴子一家死。冯歪嘴子这个男性角色可以说完全是马伯乐的反面。他踏实勤劳,乐观积极,对妻子孩子尽心尽责,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从不逃避,不疾不徐地过着生活。他的一家因这份生机和乐观被整个呼兰排挤孤立,却依然倔强顽强地生存着。哪怕妻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死去,他也并未如呼兰人期待的那样去寻死,他的孩子也在精心照顾之下好好地生长着。萧红笔下除了纪实性散文中的鲁迅之外,冯歪嘴子可以说是最美好的男性形象。他身上有质朴的乡村人民勤劳、不会被生活中的挫折打败的天性,也寄托了萧红对于国人的期待和希望,这是萧红对男性审视过程中性别意识变化的体现。

萧红对恋爱的态度在香港城市空间的视角关照之下也有所转变。《小城三月》以非常细腻的笔触讲述了翠姨的爱情悲剧,这在萧红的创作里是不多见的。三月的乡村一片春的气息,令少女的心也蠢蠢欲动,“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吹到每个人的心坎,带着呼唤,带着蛊惑”。翠姨毫无疑问就是受到了春的“蛊惑”,她爱上了我的一位伯父的儿子。从翠姨对待绒绳鞋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她不是一个敢于主动表达喜好的人,又已经被家族安排好了婚姻,最后染上结核病郁郁而终。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几乎不在作品中设置恋爱情节的萧红,在最后回望故乡的过程中,开始讲述乡村小城里人们的爱情,虽然爱情最后因为生存的关系还是湮灭了。萧红在多年的城市生活之后真正理解了故乡的人们,也理解了他们的感情。但萧红笔下依然没有圆满的爱情结局,恋人总会被战争或疾病拆散,或者妻子被生育夺走性命。从未真正在爱情和婚姻里获得安全感和稳定感的萧红,她的爱情观是十分悲观的。即便从《后花园》的冯二成子到《呼兰河传》的冯歪嘴子那里已经完成了男性形象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他的妻子也还是被生产夺走了性命。从这些人物的命运可以看出,萧红依然认为婚姻与生育必将伴随不幸的结局。

萧红从都市视角下进行故乡回望,不仅仅是抒发了对故乡的精神眷恋,对美好人性的怀念,在另一面,她也对人性精神美好的破坏的负面文化进行了反思,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性别问题。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借描写婚恋习俗思考乡村中国传统性别压迫问题。比如解释呼兰人看野台子戏时指腹为婚的传统,无论后续遇到怎样的变故,吃亏的总是女人。萧红在表达观点时也带上孩童式的朴素是非观,她先提到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因为女子胆量小。但为了反抗命运去自尽的女子是很多的,“平白的你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跳不敢跳,怕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青的女子竟干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这种平铺直叙、简单直白的表达,将传统婚恋文化对女性的迫害表达得非常清晰。乡村习俗中许多的无理之处都被萧红用这样直白的孩童式语言剖析得十分清晰,甚至直白到令人感觉残忍。这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内敛的习惯性表述的反叛。

《马伯乐》是萧红唯一计划创作的长篇小说,虽然最后未能完成,但马伯乐的人物形象很鲜活。马伯乐是萧红长期与男性知识分子接触后将她所认识到的男性知识分子的负面因素集于一身的“中国巨婴”典型男性形象。他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对孩子也冷漠得如同陌生人。在日常生活里,他是一个对家庭管理毫无帮助只会添乱的典型中式丈夫和父亲。他埋怨妻子只为家产,但他自己不仅不会挣钱,还整日找妻子要钱,将妻子的体己钱挥霍一空。他的自私在逃难过程里被描写到了极致,太太和孩子被他视为累赘,如果不是妻子手中有父亲那里得来的钱财,马伯乐早已抛弃他们独自逃跑。遇到的其他妇女孩子老人病患,他也认为这些弱者应当被挤下江水里。从多角度来观察男性,跳出家庭空间来表现男性与女性的婚姻关系,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十分罕见。这种性别意识,在她的《动乱时代》书评中也有表达,“男权社会中的女子就是这样的。她哭了,眼泪就落在那张花绸子上。女子连一点点东西都不能白得,哪管就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牺牲好话或眼泪”。^{[10](p283)}马伯乐这一人物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第一次有女性作家以女性视角出发,用他者目光塑造出这样一位极具讽刺意味的男性角色,一改以往只有女性能被他者言说、塑造的局面。马伯乐的人物形象也不是单一存在的,他的性格成因可以从家族成员的特点上溯源,他出生于一个虚伪的信奉天主教的新式乡绅家庭,家庭成员之间也因

利益关系彼此心怀鬼胎。他自私虚伪懦弱,一遇到困难就想临阵逃跑,口头禅是“万事总要留个退步”,他称这种“精神”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他和一心抗战、踊跃奔赴前线的知识分子不同,抗战只停在嘴上,实际只想着逃跑。他对战争奉行宿命论,认为战争是必然的,甚至感谢战争可以让他理所当然地逃离在他看来迂腐沉闷的家庭生活。在马伯乐身上,可以看到萧红在感情中常年遭受的性别暴力的影子:不负责任的抛弃,对感情不忠,遇到困难就逃跑……即便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在全国上下积极备战抗日的浪潮中,也依然存在着许多马伯乐式的逃跑者。萧红顶住了抗战文艺歌颂、口号、鼓舞式的主流创作方式,虽然在当时被认为是悲观、泄气的,但这样的作品也应当有一席之地。人性的灰暗面并不应该回避,这些缺陷也并不是个例,萧红将它们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并放大,在热火朝天的抗战文艺中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反思,也是长久以来失语的女性对男性的尖锐审视。

四、结语

福柯认为“空间是一切公共空间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一切权力运作的基础。换言之,空间、知识和权力的三位一体最终与后现代文化的理性主义批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1]随着都市经验的加深,萧红的性别意识经历了关注女性生存困境到以主体意识和自我言说反抗男性中心话语,再到反客为主地以女性眼光审视男性。城市空间与都市景观令萧红的性别意识萌芽和成熟,她笔下的空间、性别与身份互相缠绕。作为一名天才的经验型作家,她不断对自己充满坎坷的生活经历进行创作和提炼,以此创作出众多经典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也体现出她的性别意识的变化:从最初感受到女性被压迫的悲剧命运,到自主的反抗,再到剖析男性、甚至与男性和解的过程。她所坚守的独立人格与个性书写,至今仍可以为当代女性的生活和创作提供经验和指导。萧红笔下的女性不同于丁玲、张爱玲、苏青等同时代女作家们笔下的女性们,丁玲笔下的知识女性们的悲剧是精神的悲剧,走向哲学式自杀的死亡,而萧红反映的是生存层面最直观最赤裸的性别压迫。这种源于乡村的、来自自我体验与观察的对广大底层女性命运的同情与书写,很好地弥补了“五四”文学依赖女性文学创作中集中于知识女性和新女性们的情爱思想生活而呈现出的单薄。萧红在从乡村进入城市之后,不仅对女性面临的困境有了全新的认知,她逐渐从单一女性角度回归人性角度,并引发的对历史、社会、对奴役、权力的批判与解剖,这是中国现代女性成熟道路上的第三个路标。对独立人格与个性书写的坚守,是她在对抗男性中心话语过程中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最根本的立足点。

参考文献:

- [1]季红真.萧红全传[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
- [2]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 [3]萧红.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 [4]聂绀弩.在西安[A].聂绀弩全集(第四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
- [5]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 [6]丁玲.丁玲全集(第5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7]萧红.萧红全集(散文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 [8]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I)[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 [9]周晓辉.香港《华商报》的抗战宣传及特点[J].红广角,2016(4):19.
- [10]萧红.《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A].萧红全集(散文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 [11]陆杨,王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刘伏玲)